

重读近代史

1898年



那场未遂政变

● 马勇 著

1898年



那场未遂政变

● 马勇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98 年那场未遂政变 / 马勇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9

(重读近代史)

ISBN 978 - 7 - 214 - 06475 - 2

I. ①1… II. ①马… III. ①戊戌变法—研究 IV. ①K25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034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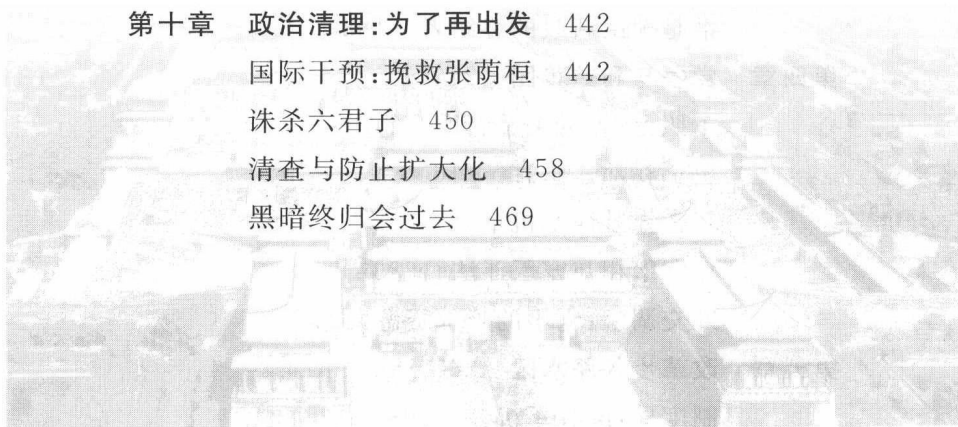
书 名 1898 年那场未遂政变
著 者 马 勇
责任编辑 金长发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插页 2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6475 - 2
定 价 3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拉开政治变革的帷幕	1
	外交难题与内政改革	1
	官场来了个年轻人	9
	激进与保守:中国政治的古老话题	28
	政治变革悄然发动	48
第二章	改革共识与差异	75
	废八股还是废科举	75
	一个可以适可而止的新科举方案	91
	京师大学堂:新政第一大举动	103
	话语权、控制权与利益关切	117
第三章	维新阵营:内部争斗与外部冲突	135
	洛阳纸贵:《时务报》的成功	135
	无法共富贵:《时务报》的内部争斗	155
	湖南新政:中国新希望	172
	谁是湖南新政的终结者	188
第四章	党争与利益集团	210
	王照上书:无关乎新旧	210
	罢免礼部六堂官	216
	超常提升四军机章京	222
	伴食宰相与宠臣斗法	233
	外交调整:党争的外部资源	248
第五章	改革步入深水区	268
	制度局:废我军机?	268

	懋勤殿：夺我大权？	283
	裁撤冗署与冗员：官场大地震	291
第六章	各路英雄会京城	312
	一个传说引发的政治恐慌	312
	等待伊藤	321
	李提摩太来了	330
	袁世凯进京	334
	绿林好汉也来了	344
第七章	想象冲突与冲突想象	349
	杨锐建议成了政局转变的关键	349
	康有为铤而走险	359
	政局变动中的日本因素	371
第八章	破绽在哪里	386
	刀逼袁世凯	386
	皇太后突然回宫	398
	康有为悄然出走	405
第九章	政治转折关键点	411
	其实没有谁告密	411
	重建垂帘体制	419
	“多余的话”：康广仁究竟说了什么	424
	第一批抓捕	430
第十章	政治清理：为了再出发	442
	国际干预：挽救张荫桓	442
	诛杀六君子	450
	清查与防止扩大化	458
	黑暗终归会过去	469



第一章

拉开政治变革的帷幕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痛苦的历史记忆。问题是如何面对这种苦难，是从此消沉、堕落，还是奋力改变？

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第二年的《马关条约》，是近代中国人的痛苦记忆。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更不能赢得国际的尊重，中国必须改变先前三十多年的发展模式，必须逐渐消除、减弱自己的特色，逐步与世界同步。知耻而后勇，这是中国圣人的教诲。中国在经历了空前的奇耻大辱之后重新起步，追随对手走上维新道路，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改变，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巨额资金砸到中国，中国经济地图日新月异，中国人信心倍增。

外交难题与内政改革

此时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态势，外国资本之所以看好中国，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政治改革方面的尝试，试图为国家提供一种长期稳定的保障，湖南的维新运动、各地的新政实践，都充分表明这个古老的国家在经历了大失败之后的大觉醒。

然而，一片升平景象中突然出现一个尴尬，一个外交难题突然而至。而此时的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还像一个雏儿。

这个外交难题来自德国。德国在这之前确实有恩于中国，那是它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联合俄国和法国，逼迫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割让，尽管中国为此增加了一笔三千万两的“赎辽费”，但毕竟保全了中国本土。

不过，三国干涉还辽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三国都觉得自己有恩于中国，中国应该对他们的贡献给予回报。于是德国人向中国提出租借胶州湾；俄国人诱逼中国签订秘密条约，逐步使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沙俄势力范围；法国人不甘落后，也提出与德国差不多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民族，从来不会忘记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人。特别是考虑到中德贸易额迅速增长的事实，大致同意德国在东部沿海找一个地方建立储煤屯船的海军基地，一是有利于保护中德之间的商业往来，一是有利于远东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均衡。只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官僚主义太厉害了，中德之间就这个问题的谈判一拖再拖，严谨的德国佬终于忍耐不住了，决定利用或者制造借口，强行武装占领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方面答应。

这场外交游戏当然需要冠冕堂皇的借口。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害，这终于为德国人提供了绝佳借口。德皇威廉二世获悉这一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反而情不自禁地感谢中国人为他们提供了理由，迅即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不惜代价占领胶州湾。

11月13日，德国舰队向胶州湾中国守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清军在48小时内全部撤退。巨野教案的是非曲直不必讨论，两名传教士死亡确实是个问题，清政府碍于此点无法强硬以对，况且中国刚经历过甲午战争，此时也真的无法轻启兵衅。清政府一方面寻求列强帮忙劝阻德国人，一方面下令清军镇静以待，不要让德国人寻找新的理由。

清政府的忍让并没有阻止住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步伐，而俄国人在清政府的请求下，先是答应劝阻德国人，继则与德国人合谋，狼狈为奸。俄国舰队于1897年12月15日占领了旅顺和大连湾。

德俄两国的不义之举无疑是中国的外交失败，特别是俄国刚刚与中国签订过密约，保证中国二十年无事，现在自己动手将三国干涉还辽要回来的大部分东西重新拿走，这不仅使中国政府极其尴尬，也使吐出这块肥肉的日本人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中德、中俄之间的秘密外交，被具有日资背景的《国闻报》获悉，《国闻报》立即发表言辞犀利的政治评论，批评德俄两国政府的强盗逻辑，进而批评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强调中国的出路只有加快政治改革，急谋自立之道，紧随世界潮流。只有自立，才能救

亡；只有自身强大，才能谋取和平，以战止战。

《国闻报》的政治评论主要出自严复之手。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监督，严复对甲午战争有着常人所难以理喻的情结。他的同学、学生，不知有多少人死于这次战争，所以他不仅密切关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进展，而且在这场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大受刺激，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檄文，探讨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并着手翻译《天演论》，期待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促使中国人从迷梦中惊醒。所以当德国、俄国背信弃义，用强力掠夺中国，强占胶州湾、大连湾和旅顺口时，严复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愤怒，再次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严复激烈的政治言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南方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同样具有亡国的幻灭感，他们甚至试图改变湖南维新运动的性质，以为亡国之后图，计划假如北方局势持续恶化，他们就以湖南为基地策动南部中国独立，为将来的民族重生奠定基础。

亡国的幻灭感促动了政治激进主义迅速崛起，梁启超开始以时务学堂为基地宣扬政治变革，以为中国君主权力日尊过盛，人民的政治权力日衰减，可能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对症下药，中国的政治变革就是要扩展人民的政治权利，还政于民，像西方那样设立议院，约束君权，限制君权。梁启超甚至还与学生们讨论改正朔易服色也就是改朝换代的可能性，这在正统思想者看来无疑超出了大清王朝的政治纪律。

梁启超的异端思想并不是孤立的奇思妙想，这里既有其师康有为思想异端的学理根据，也是梁启超那批朋友曾经讨论过的问题，谭嗣同明确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君主专制，两千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独夫民贼”把持政权且无所约束，所以他号召中国人冲决网罗，废君统，倡民主，建设和西方一样的近代国家。

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政治激进主义深刻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进程，湖南新政由先前比较单纯地发展近代经济向政治体制改革转变。课吏馆、保卫局等一系列新机构逐步设立，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官体制、警察体制开始尝试。因胶州湾事件刺激而创办的南学会，则逐步发展成一个地方议会组织，以为将来中国大局发生危险时，能使湖南像日本幕府末年的地方势力一样，强藩联合，推动全国进步和民族重建。

湖南的政治激进主义后来引发许多不必要的政治冲突，原本受到湖南各方面欢迎的梁启超简直是被驱逐出境。好在梁启超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了湖南，追随其师康有为重回京师大展身手去了。

胶州湾事件发生时，康有为正在北京。他此次北京之行虽然不是为外交危机而来，但他对政治的天生敏感和热情，使他很快因胶州湾事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康有为利用自己的人脉，与政治高层广泛接触，他虽然与这些政治高层有着地位上的悬殊，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他们发表对这些外交危机的看法，在过去的若干年中，康有为曾就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向清政府表达过意见，那几次上书虽然都没有取得具体效果，但康有为的名字在京城官场似乎并不陌生。所以，胶州湾危机可能是清政府的外交难题，但对康有为来说，无疑因此而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言机会。据他后来描述，胶州湾事件确实给他极度脆弱的心灵以致命打击，爱国保种之心油然而生，深夜中常常暗自流泪，仰天痛哭，并奋笔疾书，草就一份建议书，坦率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这份后来被称为《上清帝第五书》的文件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事论事探讨胶州湾外交危机的处理方式，而是从国际大背景详尽分析中国的处境，从政治的高度为中国指点未来出路。康有为认为，甲午战后三年来，列强看到了中国的发展，但也产生了某些忌妒或遏制的心理，因而在西方国家中，一个重要的舆论就是谋划怎样瓜分中国。这才是中国面临的真正危机。

基于这种判断，康有为认为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只是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第一步，是给西方国家提供经验。德国如果因此而成功，那么势必激发其他国家起而仿效，中国必将面对列强更大的压力，甚至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康有为郑重警告清廷主政诸公：列强计谋得逞，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根据康有为的分析，尽管中国在甲午战后，在度过了难得的三年“维新时代”之后，依然不被列强视为一个正常国家，依然被他们任意欺凌，主要还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昧无知，不知天下大势，不知变法图存，得过且过。结果，中国经过了三年“维新时代”不是越来越强，而是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被人瞧得起：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

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凡此，都是中国大病根。

知道了中国问题症结之所在，康有为当然比较容易提出自己的治疗方案。他的基本意见是中国的外交危机不要机械地从外交上找原因，而应该打开思路，从内政上找出路。中国不能在内政上、在政治上有办法，不能练好内功，不能使中国尽快以民主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世界舞台，那么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处境依然不会改变，中国依然是被欺凌、被侮辱的对象。

以这个判断为基础，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因应胶州湾危机所导致的民族主义情绪，尽快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激励人心，次明耻以提振士气。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改革政治制度，一意维新。中国只有在政治上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中国只有建立与东西洋各国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制度，才能使东西洋各国以平等兄弟之国的身份待我。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优越性不是要建立与东西洋各国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在同一或近似的制度框架下保留民族的独特的文明形态或生活方式。为此，康有为提出上中下三策：

上焉者取法俄国、日本，以定国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重现近代国家，从制度上奠定近代国家的基础；

中策则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集思广益，实行变法，次第施行；

下策是中央政府拱手无为，听任疆臣以本地情形各自变法，以局部试验为全国变法提供经验，或者干脆就是强地方弱中央，弱干强枝。

康有为自信，实行上策，国家可以富强；能行中策，中国还可以维持积弱的局面；仅行下策，我大清王朝或许依然受人欺凌，但也不至于灭亡。总之，不论大变、中变还是小变，中国必变则是唯一的选项。

按照清廷规则，康有为虽然自1895年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之后并没有在工部上班，但他的编制上依然保留在工部，因此这份上书要想呈递政治高层，要想让皇上看到，就必须通过工部主管这一关。

不料工部尚书崧淮在读到康有为文中“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

得矣”时，虽然感同身受，以为康有为说得真好，极为痛心，极为真诚，但无疑具有一点“犯上”倾向，有点政治上的不正确。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是，胶州湾外交危机在崧淮等政府诸公看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交事件，往重了说也不过是德国人过于霸道，有点欺负中国。这件事就事论事，就是中国国力不如人，似乎无需上升到什么政治层面，更无需怀疑刚刚确立的维新路线。康有为的文章虽然写得好，话也说得透彻，但总觉得有点夸大了胶州湾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所以崧淮不愿以工部的名义转递康有为的这份上皇帝书。

崧淮恐怕再没想到他不愿转呈的这份上书日后会搅起一场什么样的历史风波。

崧淮字寿泉，满洲镶蓝旗人。原为翁同龢任工部尚书时的属员，据说是翁同龢一手提拔起来的。翁同龢获知康有为上书的情形后，他当然有办法将这份上书直接交给皇上。但翁同龢不想这样做，他觉得要想这份上书达到应有的效果，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正常渠道报送皇上，所以他凭借自己与崧淮的交情，先后两次到工部与崧淮交涉，作疏通工作，劝崧淮按照程序将康的这份上书转呈。或许是崧淮受到其他更高层面的压力，或许是他真的认为康的这份上书没有多少价值，总之他硬是不给翁师傅面子，就是不愿以工部名义转呈这份文件。

康有为的上书没有通过正常渠道上达天听，但在京城内外却广为传抄，开明官僚和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大致认同康有为的危机意识，能够从胶州湾事件中发觉政府的既定方针可能需要修正和调整，而守旧或正统者似乎认为康有为危言耸听，夸大危机，中国决不能如此朝三暮四，得陇望蜀，好高骛远，而必须坚守三年来的维新共识，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外交问题归外交，内政问题归内政，按部就班，稳扎稳打，向着既定目标迈进。

很显然，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并没有很快成为知识界、思想界、政治界的主流意识，稳健的、有步骤的维新运动似乎依然是朝野基本共识。心灰意冷的康有为深切感到偌大的京城竟然没有多少政治知音，于是他准备离开令他失望的京城，返回故乡继续自己的事业。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临行前，康有为在向各方面辞别的时候，有意无意中在其弟子梁启超的好朋友曾习经的陪同下拜访都察

院主管徐寿蘅。死马当做活马医，康有为顺便将他的这份上皇帝书送给徐寿蘅一份，同时自然中流露这份上书的遭遇。徐寿蘅的政治理念比较保守，工作作风比较持重，特别是由于职责所在，总是显得无私无畏，并不像工部尚书崧澐那样畏首畏尾，胆小怕事。他看了康有为这份上书，并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反而认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于是签发报送皇上。

皇上看到这份文件后，并没有像崧澐所预想的那样感到不愉快、不舒服，而是非常高兴，以为这份上书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与自己的许多想法暗合，于是欣然接受，责成总理衙门安排召见。康有为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

康有为的奏折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与技术官僚就事论事处理外交事件风格显然不同，这一点在技术官僚看来或许文不对题，驴唇马嘴，但在皇上看来，却甚合心意，不能不引起皇上的思考。

无独有偶。如果满朝文武百官只有康有为一个人这样看这样说，不论这种说法多么动听，无论皇上怎样喜欢，恐怕都难转为政治实践。巧得很，1897年12月30日，杨深秀被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第二天，杨深秀就向朝廷递交了一份《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奏折的基本思路竟然与康有为的《上皇帝第五书》出奇的一致。

杨深秀认为，自1895年以来的维新运动确实意义非凡，成就巨大，然而这三年“维新时代”所呈现的问题与之前三十年洋务新政的问题相类似，依然是只变其末，未变其本，所以才有了胶州湾事件这样的“外交困难”，才有德、俄、英这些国家不按常理出牌。杨深秀的分析与康有为的一样，自然很难获得主政诸公的认同，但对那些“政治边缘人”，或“政治新秀”，或“权力失落者”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是批评现实政治的一个绝佳借口。所以，杨深秀的奏折一提出，就引起政治高层的极大反响和震动，这毕竟是因胶州湾事件而引发的“外交困难”竟然推导出政治变革的结论，这实在有点惊天动地，预示着新的一年不可能依然如往昔那样风平浪静、浑浑噩噩。

皇上和诸位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三年来未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他们真的以为中国在甲午战后知耻而后勇，发愤有为，三年大见成效了呢？

杨深秀的“盛世危言”无疑深深刺激了皇上和他的“众爱卿”。痛定思痛，皇上在将这份奏折上报给已经退居幕后颐养天年，但依然不辞辛劳为大清王朝政治决策负最后责任的慈禧太后过目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1898年1月16日，皇上在召见群臣时谈及外交困难和时事，询问众爱卿在这诸多困难中，究竟应该以什么事为先。皇上在作这种设问时当然已有自己的答案，他接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以为应该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以变法为急务，而不是就事论事，整日忙于具体事务，而不明世界大势、中国大势。

皇上的这些说法可能太突然了，各位重臣多日来已为胶州湾事件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心思去考虑什么政治改革，什么变法图存，更何况诸臣并不一定认同杨深秀、康有为这样的说法，因为胶州湾事件并不意味着过去三年所确立所执行的维新路线有什么错误。胶州湾事件只是一个外交事件，并不应该将一个外交事件夸大成一场政治危机，更没有必要上升到生死存亡这样的高度。所以，众卿在听到皇上的这个指示后，默然无对，即便是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吞吞吐吐地表示，要说进行什么改革，恐怕还得从内政改革做起。

众爱卿一时跟不上皇上的思考，这也难怪。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所有的臣僚都不过是执行工具，无需思考，更不需要独立思考。他们只是在被动接受皇上的指示，然后再想法落实皇上的指示。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作。皇上通过胶州湾事件感觉中国可能需要一场政治变革，主要是受到康有为、杨深秀这样的“政治边缘人”或政治新锐的思想刺激。这种带有异端的眼光很难在成熟的、既定的官僚体制中发生。

皇上政治变革的期待没有很快在政治高层获得回响。不过，年轻的皇上并不会就此放下，更不会就此甘心。他在退朝后责成翁同龢起草三道上谕，一是要求改进中央政府各衙门的办事作风，提高效率；二是要求各省督抚切实淘汰冗员，举荐人才，开创新局；三是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快筹款开办制造局厂。总之，皇上期待中国能够在内政方面有办法。

杨深秀的建议与康有为上书的政治主张出奇的一致，这两者之间是

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史阙有间不可妄加猜测。研究杨深秀的人大都认为这是杨的独特见解，而研究康有为的人，或以为这个主张来自康有为的启示，或者干脆就是康有为的代笔。直接的证据虽然没有，间接证据还是有的。那就是杨深秀在上《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之后第二天，也就是1898年1月1日，又上了一个重要奏折，建议朝廷联合英、日以抗衡德国和俄国。

官场来了个年轻人

康有为的上书终于受到皇上的重视，那是后来的事情。康有为在与都察院主管徐寿蘅等人告辞时，离京南返的决心并没有因为徐寿蘅的赏识而动摇。

1897年12月11日，康有为命仆人将行李装上车，他准备第二天离开北京。确实，年关将至，天寒地冻，如果遇到结冰，南下途中无疑更加困难。既然在北京已经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那么干脆回家去吧。连续数日，康有为四处走动，登门告辞，感谢他在北京所受到的款待和帮助，当天只有当朝帝师翁同龢还没有拜访告辞。翁同龢与康有为有知遇之恩，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翁确实太忙了，看看这一时期翁的日记，就知道每天都在忙着与德国公使进行交涉。所以当康有为登门告辞时，翁并不在家，康只好留个字条表达告别之意。

繁忙不堪的翁同龢回到家中看到字条，心中有点惋惜。他知道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已经送达朝廷，也知道皇上对这份上书很满意，所以他在第二天（12月12日）早朝时向皇上郑重推荐了康有为，皇上也似乎欣然接纳了这个推荐。于是，在退朝后，翁同龢连忙赶往康有为的住所南海会馆，将这个喜讯第一时间告诉康有为。

翁同龢抵达南海会馆时，康有为尚未起床。朦胧中被人唤醒，并获知这个消息，自然是一番欢喜。翁同龢劝告康有为，不要急于南返了，相信朝廷，相信皇上，相信最近就一定会有具体的好消息。

康有为获悉这个消息当然非常感动，他的多年努力终于将变成现实。康有为在后来写了一首诗比较真切反映了自己当时的激动心情：

胶西警近圣人居，伏阙忧危数上书。

已格九关空痛哭，但思吾党赋归欤？

早携书剑将行马，忽枉轩裳特执裾。

深惜追亡萧相国，天心存汉果何如？

诗意虽然比较隐晦，但多少透露出他与翁同龢谈话的信息。他把自己与翁同龢的关系比喻为汉朝的韩信与萧何，说翁同龢深夜来访并挽留他，就是当今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是大清王朝礼聘能够辅佐江山的能臣贤相。不过，由于后来政治局面的突然变化，翁同龢前往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会面，并不见于翁同龢的日记。

翁同龢的挽留是康有为中止南下回归故里的原因之一，而康有为最终决定留在京师的另一背景是他的另外一位官场朋友、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的帮助。根据康有为的记载，他在戊戌年间曾数次为高燮曾代拟奏折，可见他们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还知道，康有为在准备离京南下的时候，曾草三疏由杨锐分发给王鹏运、高燮曾寻机上奏朝廷。

康有为代高燮曾拟就的奏折也在12月12日呈递皇上，与翁同龢推荐为同一天，而这份奏折并不是什么政治建议，而是以高燮曾的名义推荐康有为，建议朝廷给康有为一个适当的名义，令其出国考察，并相机参加西方各国主持召集的弭兵会，大约有从事民间外交的意思，但又具有政府背景，由政府提供相关费用，照会各国外交机构；并建议皇上召见康有为。

这份推荐奏折是清廷体制内官员第一次举荐康有为，并且当天受到皇上的重视，予以批示，一时间传为美谈。

皇上的批示只是建议总理衙门进行研究，拿出方案，但究竟应该怎样使用康有为，皇上并没有一定之见。

总理衙门对皇上的批示进行了研究，对应方案对康有为说来并不乐观。总理衙门认为，弭兵会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对任何国家都没有约束力，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委派什么大员前往参加。高燮曾的推荐落了个空。

总理衙门否决高燮曾的建议，似乎并不像康有为在后来所回忆的那样有多少阴谋，因为高燮曾的建议不仅有违大清王朝体制和惯例，而且从实际情形看，委派康有为相机参加西洋弭兵会更不是当时之急务，并不值得总理衙门现在就作出决定。而总理衙门当时最头痛的事情还是正在进

行中的中德、中俄交涉。

至于建议皇上召见康有为面谈，主持政府日常事务的恭亲王奕訢以为这个建议不可行，主要是有碍于大清王朝的礼仪制度。康有为级别太低，由皇上出面与其交谈显然是不合适的。恭亲王建议，如果皇上有什么问题需要向康有为咨询，或者康有为有什么建议需要向朝廷表达，尽可由总理衙门诸位大臣代为询问和转达。

恭亲王的建议化解了矛盾，说得也合情合理。于是在旧历新年即戊戌年正月初二，总理衙门书面通知康有为第二天与王大臣见面，接受问话。

年初三（1898年1月24日）下午3时许，康有为如约来到位于中南海的西花厅，接受总理衙门王大臣的咨询和问话。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参加当天对话的王大臣为荣禄、李鸿章、翁同龢、廖寿恒、张荫桓。

康有为生于1858年，此时40周岁，进士出身，官衔为工部主事。

荣禄，满洲正白旗人，生于1836年，此时62岁，为慈禧太后欣赏和信赖的老臣，也是此时清廷权力中枢中满洲贵族的重要代表，是恭亲王之后的重要人物，任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等要职。

李鸿章生于1823年，时年75岁，为垂垂老翁。李鸿章是继其师曾国藩之后汉大臣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也深得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只是早几年因为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所以现在并不拥有很大的实际权力，只是一个伴食宰相而已。

翁同龢生于1830年，时年68岁，亦为垂垂老者。翁同龢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为同光时代书家第一人。翁同龢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学问好，人品好，因而为同光时代两朝帝师，是皇太后和皇上非常仰赖和依赖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因甲午战败靠边后，翁同龢顺位成为清政府中汉大臣的首席人物，此时也最为繁忙，承担诸多事务，此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廖寿恒字仲山，生于1839年，此时59岁，历任湖南学政、侍读学士、总理衙门大臣及礼部、刑部尚书等，此时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具有浓厚的维新思想，也比较信服康有为的理论。

张荫桓，字樵野，生于1837年，此时62岁。张荫桓没有一般官僚所

具有的功名，他在纳资为知县后，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干出来的，当然也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携，逐步爬上政治高层，曾充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奉命出使过英、美、法、德、俄诸国，是当时清廷重要的外交人才，也是李鸿章、翁同龢从事外交活动的重要助手，也深得皇太后和皇上的信任。不过他的官衔并不高，此时仅为户部左侍郎。张荫桓是1898年中国故事中最重要角色，只是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不被重视，他的结局为故事的终结，而正是他的提携、策动，才有康有为那年有声有色的政治活动。

康有为与张荫桓是广东南海小同乡，鉴于张荫桓在清廷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康有为仰慕、巴结的重要对象，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康有为在北京官场最重要的凭借和靠山。据说，康有为经常出入张荫桓官邸，也经常夜宿张家，彻夜长谈。当然，张荫桓对这个小同乡之所以非常欣赏，除了同乡一层原因外，主要还是在政治理念及内外大事上看法比较一致。

这几位大臣中年龄最大的李鸿章，较康有为年长35岁，年龄最小的廖寿恒，也较康有为年长19岁，所以说康有为那一天是官场上新来的年轻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些老于世故的人精品评打分。

西花厅问话至今没有发现官方记录，但是综合康有为的追记、翁同龢等人的相关记录，大致也能够看出这一天谈话的大致情形。

一般寒暄问话后，康有为就国内外时局、变法维新等重大问题尽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康有为在这段谈话中，主要谈的是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修铁路，开矿产，广借洋债等问题。从内容看，康有为所谈似乎没有多少新意，许多问题已经达成共识，甚至正在实践。所以从老一代政治家的立场看，康有为这次谈话并不算成功，除了狂妄，除了大言不惭，似乎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几位大臣不过是姑且听之，并没有怎么太介意。

在康有为演讲告一段落后，荣禄不经意地告诫康有为，变法维新固然是大清王朝政治上的一条出路，不过任何变法都必须守住一定的底线，现在的维新运动也是如此。总之，荣禄认为千变万变，祖宗之法不能变。

对于荣禄的告诫，康有为似乎非常恼火，或许在这之前，在康有为的